

第九章

“联欢”变“离恨”

星期五轮到我值宿，还有少校军需高村和新来的电信中尉关云中。今天的行动定于下班后，吃过晚饭开始。我首先在后院备好一辆三轮摩托车，让刘大个子负责卡住烧锅的电话，另外两名亲兵负责灌酒，我则亲自动手报那一掌之仇。

七点钟以后，高村到楼下洗澡去了，只有关中尉坐在值宿室守着电话，看报纸。我对他耳语了一番自己的打算，他愣愣地望着我，还想问个究竟。我只好告诉他瞒一下高村就行，我出去一个小时就回来。他傻呵呵地竟跟我来到后院。没想到汽车司机王师傅也非要跟去凑热闹不可。我们四个人的行动已属冒险、犯法了，岂敢将值班司机也带上？我没答应他。摩托车上坐着三个带刺刀的水兵，一溜烟地驶出了后大门。

这是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街。摩托车的前灯直射增盛烧锅的大门，刘大个子前去敲门。当角门打开的同时，我立刻关闭了车灯。开门的老头还以为宪兵队的什么干爹来了呢，没想到是一群不速之客。我一个箭步直奔账房闯去。屋里灯光

明亮，那个大麻子正在和姓尤的掌柜在闲聊。一见我们几个人闯进来，立刻脸色煞白颤抖着站起来，心知大祸临头了。

我先让刘大个子冲进里屋把电话守住，然后一把薅住大麻子的衣领将他扯到面前吼道：“你老小子还认识我不？今天老子要报那天一掌之仇！”说着，我用尽全身之力一拳向他左腮打去。这家伙怎经得起我这沉重的一击，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双手捂着腮帮子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刘大个子从里屋出来，也要动手，被我拦住了。我叫呆若木鸡的尤掌柜带两个丘八爷去给我灌酒。老头子早已魂不附体，忙招呼门外的伙计带路去弄酒，自己连连冲我作揖，不知说什么好。里边的酒好像是早装好准备外运的现成货，不到五分钟伙计就拎出一个柳条编的大酒桶来，足有二三十斤重。我假惺惺地掏出十块钱拍在柜台上，对老头子说：“老子知道你姓尤，你可以告诉你那侄子，我等着会会他……老子也不白喝你的酒！”

我示意两个水兵把酒搬上车去，又照坐在地上大麻子后腰上狠狠地踢了一脚，给了他点“利息”。只听他哎哟地叫出声来：“大爷，饶了我吧！”

我到外边踏着了摩托车，刘大个子才跟出来，电驴子一溜烟奔司令部去了。途中刘大个子把电话机里的云母片递给我看。我很佩服这小子的干练，电话线没弄断但已不能用了，还一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我接过随手甩到了马路上。进了后大门，司机王师傅直冲我乐：“这么快？才半个点儿就把事干完了？”我把酒桶交给他保存好。亲兵小于子掏出十块钱递给我说：“给钱岂不是冤大头吗？这就够便宜这群狗日的了！”我哪能把钱收回，顺手推给了刘大个子：“哪天，你们哥几个去吃顿饺子吧！”大个子班长咧咧嘴收下了。

我叫他们三个单个儿溜回宿舍去，别声张。自己脱下上衣披在肩上，装出没事人一样上了楼。关中尉还守在电话机旁，我悄声问高村哪儿去了，他说在电信室下棋呢。我长出了一口气，开始详细地给他讲这出戏的前因后果，他听得津津有味，连竖大拇指叫好。

第二天，按惯例值宿者可以提前半天下班。中午，我到车库把酒桶驮上自行车就回家了。至此，大功告成。但日后增盛烧锅是否将采取报复行动，我却一点底儿都没有。心说，管他的！走一步算一步，以后小心提防就是了。

干完这件事，虽说出了口恶气，但心里毕竟犯嘀咕，每天下午去大学的路上和在课堂上不免胡思乱想，恍恍惚惚。连最爱听的法律课也心不在焉，笔记也记得不得要领。幸亏我那个好朋友——比我大两三年的同学王升利常借给我笔记抄，使我不至于把功课落下太多。

这个王升利，既可爱又可怜。为人聪明、爽快，是个家庭出身贫寒的南方人。家有一母一弟，为人至孝。供职于伪满国家的“兴业银行”，也讲一口流利的日本正统官方语言，颇得日本上司的信任。其家庭生活水平维持在上中等程度。

也许是职业关系，他每天都和花花绿绿的大捆钞票打交道，久而久之形成了他金钱至上、钞票万能的人生观。“爱财如命”四个字可以概括他的人格、品性。他常让我把余钱交给他存起来吃利息。所以我那每月二十元的“体己”常常凑成整数（一张“老绵羊”）交给他存起来生息。王升利二十七八仍未成家，一直想找个有钱的老婆，哪怕是“母夜叉”，只要能让他发财就行。上天不负有心人，还终于让他找到了。这姑娘是哈尔滨有名的胡家四小姐，俗称“胡四

儿”，长相还可以，决非“夜叉”，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河东吼”。曾当着我的面就扇她老公的耳光。而王升利则遵照基督“遗训”，用自己的腮帮子去“左右逢迎”受之无愧。

他丈人胡二爷原是张作霖手下的一个师长，曾为大帅出生入死，深得大帅器重。借兵权官势也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在“九·一八”之后便隐居下来。现已年过花甲，在四个姨太太的陪伴下蛰居在哈尔滨。“胡四儿”即四姨太所生，庶系排行老四。

他们的婚姻基础就是“财、色”二字。王升利小伙子聪明伶俐，长得很帅；胡家则有的是钱。婚后生活的主题便是打架、闹离婚、求和、再打。但这种日子，王升利凭着他惊人的执着和耐力，竟然熬了过来，叫我没理由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多次争吵、武打，都是由我出头将两个人拉到小酒馆去吃上一顿，喝几盅，四小姐才能消气。而我的朋友则笑脸相赔，好像耳光打在了身后墙上，与他无关。

让我始终不明白的是这“胡四儿”到底有多少钱交给了这个小财迷，让他如此忍气吞声？这个谜底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春天才在我面前揭开。当时，王升利的财神奶奶老婆与他协商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倾其所有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县郊区廉价购买了大片土地。夫妻俩摇身一变，成了有财有地的大地主、大老财了！我这个财迷心窍、毫无政治远见的朋友，还竟然在地契上得意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满以为这回，这大片土地全属于他自己了。听说为了土地的产权问题俩人还曾多次争吵。他们万没想到，当年冬天便闹开了土地改革，翻身农民们要向地主讨还血债，清算剥削账！地主阶级全吓破了胆，走死逃亡，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有一天，双城的农民们找到了哈尔滨，指名要地主王升

利回农村去向广大农民低头认罪。可怜我这个连自己土地上的禾苗是什么样都未见过的“地主”朋友，又惊又怕，悔恨交加，在农民们的催促下走投无路借口去换换衣服，竟在自己新的工作单位哈尔滨铁路局的地下室里喝下了一大茶缸硫酸，惨死在地下室的台阶上！据给他收尸的弟弟讲，尸体下巴和前胸都烧成了黑洞……年仅二十八岁。这都是后话了。

光阴似箭，转眼大江开封，春潮涌动。江上军司令部也像松花江两岸的景色一样，被“绿色”所蔓延、覆盖。听说在三月份之内，全军要彻底脱掉蓝色的海军服，一律改穿上绿色的陆军服制。军事顾问松山调走，换来了中佐内田实。陆军中将李文龙即将到任为本军司令官。尹大胡子和原海军少将参谋长严昌泰改任为“军事部参议”回家养老。

这位新来的日本中佐内田顾问有五十七八岁，是一个粗壮高大的军人。左右分开的仁丹胡高高翘起，看上去有些俄国人的气派，看人总是笑眯眯的，士兵对他举手敬礼，他一定还礼，决不傲慢；说话简捷，口齿伶俐，从不啰嗦、重复，确有大将风度。我一直想找机会接近他，总没得逞。有时在走廊里相遇我必定立正向他鞠躬。他也总是笑眯眯地点点头，有时走过去了还回头望望我。对这类大人物我知道阿谀奉承的口头马屁经是全不管用的。

一次，佐藤上尉拎着一只靴子到副官处来，说是内田顾问的，想派人出去给开线的地方缝一下。本来这是勤务兵的事，但正等待时机的我却立刻接了过来：“后街的鞋匠我认识，让我去吧！”被我请吃过的佐藤当然没有异议，对宫崎副官说：“叫左君去办吧，错不了的。”我像手捧珍宝一样走出门，二十分钟后就把缝得整整齐齐的靴子交到佐藤手上，

才花了三角钱。佐藤掏出一元钱来，我却装大方愣说只花了一角钱，说啥也没要。

就这一回，我的马屁“隔靴”搔到了“痒”上。第三天，内田顾问突然亲自拉开门喊我“你来一下”。宫崎、吾妻刷地站起来，立得棍儿一样，示意我马上跟去听令。我不知怎么回事，心怀鬼胎地走进了顾问室。

内田顾问敞开胸扣，一边捋着胡子一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日语？听说你在上大学。好好干，将来会有出息的！”我挺直腰板流利地回答问话，看来他挺满意。谈话时，我奇怪地发现，中佐大人并不太爱吸烟怎么在办公桌上放个烟灰缸呢？后来他往里吐了口痰，我才明白其妙用。从此，每次去顾问室我都顺手将这个“痰盂”带出来，到卫生间冲洗干净再送回去。内田顾问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纸袋来，递给我说：“认得这东西吗？”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女人用的染发剂药粉袋。上面黑白两色印着一个日本女人头像，只有三个字：“白发染”。我以为他是要让我去买这种东西。没等开口，他又接着说：“这东西是日本货，不管用。你们满洲老太婆用什么染发？”我心里马上明白，这老家伙是在为老伴效劳呢，一时“福至心灵”顺口胡诌了起来：“报告顾问，我妻子的学生家长是开理发店的，染白发是祖传的绝技。中药配方，染一次可以挺一个多月。如果顾问夫人想试试，我可以奉陪、效劳……”这套马屁经我一口气念完，内田顾问露出满意的微笑，挥挥手：“去吧。过两天我叫老婆来，你带她去试试……”我美滋滋地回来，宫崎副官追在屁股后头探问是什么事，我如实汇报，他低头笑着走了。很快，“马屁精”的头衔加到了我头上，只是没人发给我这份“职务津贴”。

浩瀚的松花江上冰排渐稀，水运开始畅通。江北的江上军作业队（水上工兵）早已编制成形。以陆军少将洛合为首的这支新兵队伍大约近千人，所以编制为一个教导团。但这个团却有两名上校团长，一个是日本士官出身的叫于世良；一个姓张，是张学良的旧部，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汉。一个槽里拴两条毛驴，岂有不争食的？于团长日语呱呱叫，张团长却连中国话都往往词不达意。俩人争权夺势互相拆台的把戏屡见不鲜，下边的日、“满”人营长、连长只能熟视无睹。反正兵权在日本人手里，乐得在一旁看他们狗咬狗。

这张团长曾三番五次请我下饭馆，希望在内田顾问那里帮他参奏于团长嫖妓、渎职的“罪行”；而于团长则经常邀我到他家里由妓女陪着喝酒、吃饭，顺便来几嗓子京戏，待我不薄。我自知官卑职小，哪个也得罪不起，便两头应酬，全当朋友，乐得个酒肉常香。

不久，中将司令李云龙在庄严的礼号声中到任。这也是个六十来岁的彪形大汉，蓄着一撮日本胡，腰板溜直，挺有军人气魄。听说也是张学良旧部。“九·一八”事变时，交枪投降有功，节节提升，现在成了本军的挂名司令。此人脾气极好（所以一听炮响就投了降），待人温和，没官架子（尤其对日本人）。我看到他和参谋长林保治相遇总是他先敬礼。如此“礼贤下士”，论马屁水平已足可为我师表了。按说，这样一个司令理应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了，但从他到任的短短半年时间里，却发生了两起重大事故，使其成为江上军历史上最倒霉的一任司令官。

1943年以来，江上军陆续补充陆军指挥官。大批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壮军官，日、“满”、朝鲜人都有，来到本军当

了连副、排长。长统军靴、大战刀耀武扬威，横冲直撞，不可一世。特别是有些朝鲜族军官，全以半个日本人自居，对江上军的水兵像有什么深仇大恨，动辄拳脚相加。在大街上、司令部楼里院外，屡屡发生殴打士兵的事件，特别是对那些尚未改穿陆军服制的水兵。不论何时何地，经常看到他们叫士兵笔直地站着，或扇耳光或用竹条抽打手心，不打到口鼻流血，手心青肿绝不罢休。此情此景日本人见了不以为奇，听之任之。久而久之，陆海军之间，日、“满”、朝鲜人之间的仇怨越来越深，官兵之间关系非常紧张，一种仇恨的怒火在士兵心底燃烧，已至爆发的边缘。

为了化解矛盾，安抚军心，顾问部筹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军民联欢大会”。

特意发函邀请哈尔滨附近的呼兰、滨县、汤原、巴彦等县的国兵家属：父母、妻儿来作业队与服役的士兵相聚、联欢。这本是一件好事，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项收买人心，平息日“满”官兵之间矛盾的策略。谁知却适得其反。

家往外县距离较远的一些国兵家属，接到通知后有的竟提前一两天赶到哈尔滨住在旅馆



里，等待与亲人团聚的那一天。当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已有三三五五结伴的乡下人背包的、挎篮的、拎筐的，带着食物、幼儿赶集一样集聚在了司令部附近的江沿码头，眼巴巴地盼望着早一点过江。江北的“江上军作业队”营房门前除了一个木制的岗亭外，也破例地多插了几面五色“国旗”。操场中央摆放了两排士兵吃饭用的长条木桌和长凳。连台布也没铺的大木桌上摆着一些掉了瓷的搪瓷碗，伙房里热气腾腾，烟囱里滚着浓烟。不知在准备什么待客的“美酒佳肴”。

直到八点多钟，才从江北开来了四只木制的运兵艇，大约一百多名家属扶老携幼地挤上了船，缓缓离了岸。江北作业队距江岸还有两华里的路程。家属登岸后，由负责迎接的官兵引导，排成了单行直往营房

江上军士兵在训练

而来。

这边操场上早已列队等候的士兵们，则伸长了脖子，没有口令头却全转向了营房大门。终于，一军一民两个队伍在相距二十余米、间隔着两排桌椅的大操场上相见了。几百双眼睛在互相寻找着熟悉的面庞。惊喜的呼唤声此起彼伏，一时队伍有些变形、散乱开来。当官的忙喝令士兵立正，又招呼家属们到桌前就座。但家属中没一个人肯坐下，而是都在瞪大眼睛辨认这些服装一致又都剃光了头的人中哪个是自己的亲人。日本人排长吼叫着



士官班长整顿队伍。“站好！等候点名。离队向前三步走……”于是，在乱哄哄的人声中，“满人”班长按来客名单喊出某连某排的人名，由不同的行列中大步走出一些士兵来。他们由于激动而涨红了面孔，手足有些无措，向前走的动作也因此失去了往日训练的规范；或多走了一步或刮碰了别人。惹得身披绶带的值星日本排长连赏几个大耳光，“八卡！八卡！”骂不绝口。

终于点名完毕，操场上出现亲人团聚的光景：有的父、母与儿子相见，相拥相抱问寒问暖；夫妻相见泪流满面，悲喜交加；有的抱起新生的婴儿贴面、亲吻，不一而足。家属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带来的各种食品、生活用品摊开桌上，将苞米面发面饼、松江特产的鲤鱼干、罐装的酱菜，还有短裤、内衣、袜子、鞋垫等等东西往亲人的衣袋里塞。其他未被点名、家属没来的士兵则集合在操场另一端，一部分士兵表演陆军刺杀动作，算是慰问演出的节目；另一部分则按日常规则进行操练。那些日本、朝鲜人的少尉排长背着手来回巡视在会场的周围。有的狞笑，有的板脸，尤其那些日本青年军官像集中营里的典狱、看守在监督家属探监。他们挎着大战刀，背着手踱来踱去，有的贼眉鼠眼直往年轻的小媳妇身上盯。更有的在存心找茬儿，要显示当官的威风。几个出校门不久，官瘾正浓的鬼子，以“长官走近不起身敬礼”为由，当场拉起正与父母、妻儿亲昵的士兵就是一顿耳光，打得士兵口鼻流血；有的以“与家属见面流泪，是对军营生活不满”为由而对士兵拳脚相加，并赶回营房取消了“联欢”资格……一时间，吓得家属们哭喊声四起，全场大哗。胆小的农民连连向日本军官作揖求饶，竟也遭到粗暴的推搡和辱骂。至此，亲情未叙、妻儿蜜语未竟的国兵们都不

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有的护住父老，有的安慰妻儿，又是一片骚乱。望见此情此景，远处正在操练着的士兵们也停了下来。一个个眼中都流露出愤怒和悲怆。

军官们几次嚎叫着让人们坐下来，但没有一个人听令。家属和士兵们紧紧拥靠在一起，愤怒、抽泣和眼泪使“联欢会”会场的气氛变成了“集中营”里的生离死别，无法再进行下去。当司灶兵抬来招待客人的午餐：热气腾腾的高粱米干饭、疙瘩白炒土豆时，没有一个去摸一下碗筷……父母、妻儿留下带来的食物和日用品，在一片哭泣声中与亲人告别，三三两两地走出了营门。被接见的士兵们则拥挤在大门口，肝肠寸断地目送着亲人离去。

运送家属的船一离岸，家属们不禁大放悲声，哭喊声响彻松花江面。到岸时，有的家属竟哭昏在司令部门前的栈桥上。

由江上军顾问部精心谋划的“军民联欢大会”这出戏就这样以“探监”开头和“生离死别”收尾，宣告破产。不但没起到改善官兵紧张关系的作用，反而加深了官兵、日“满”人之间的仇恨。为半个月以后的“兵变血案”埋下了炸药。

当天受命负责主持这场“联欢会”的日本军官是少校营长平川。他坐在二楼办公室里，跷着二郎腿抽烟、喝茶水，对院子里的情景不屑一顾。他以为，让家属来军营与士兵会见已是大日本皇军的“皇恩浩荡”了，是“满洲国”的良民就应该因此而感激涕零，山呼万岁，哪还用自己亲临现场。直到听见营门一片哭声，他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忙召来白营长了解情况。白营长只好用半通不通的日语简单地讲叙了一下“联欢”的经过。这时平川才明白，自己负责的这个

“军民联欢大会”演砸了锅。不用说，这是违背了顾问部的初衷，违了军令。想到这儿，冷汗不由得从鼻尖、额头冒了出来。

“军民联欢大会”不欢而散的消息当晚就传到江南岸。第二天一早，整个司令部里的人就全都知道了此事。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听说不少家属昨天滞留在市里的旅馆中哭哭啼啼不肯离去，担心着儿子、丈夫的安危。有的三五成群坐在江边台阶上望着江北大哭。市民们纷纷围观、探问。“军民联欢大会”的“显著成果”已经扩大到市区了。

为了核实真相，情报处处长丰永立刻将作业队的平川和白营长叫到了司令部情报处，听取情况汇报。下午两点多钟，俩人又被叫到了内田顾问的办公室。不一会儿那里就传来了内田的怒骂和劈劈啪啪的击打声。司令部上下一片寂静，各处室鸦雀无声。我心想这回顾问大人的竹剑有了活生生的肉靶子了！半个多小时后，平川营长才满头大汗地退出了顾问室，光头顶上青一块紫一块，眉尖有鲜血直往下滴。他拒绝了勤务兵的包扎，只在伤口上贴了块粘膏便走出了司令部，去回江北发泄他的愤怒了。这期间，作业队最高指挥官洛合少将也来到了司令部，呆坐在副官处。这个六十多岁的在乡军人，原是日军大佐退役，长得瘦小枯干，还有些驼背。一副老朽之态。此刻他双目紧闭，双手拄着齐顶高的大战刀，因满口假牙而有些上颚的下巴频频抖动，不知在祈祷着什么。

直到丰永少校走来，对他说了声：“阁下，请。”老头子才睁开眼睛，麻利地站了起来跟在丰永身后去接受内田顾问的训斥。估计洛合少将不至于挨打，否则这一把老骨头非让“土内”（竹剑）拍碎了不可。不过一顿狗血淋头的臭骂是绝

免不了的。这不，顾问室里的吼声又响起来了……

当时的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但新闻媒介、舆论工具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偷听外界广播或传播不利于“大东亚圣战”的消息全得掉脑袋。所以，处于“后方”沦陷区的东三省百姓和我们这些人全被蒙在鼓里。外界的信息被“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的烟雾弹遮盖得严严实实，一丝不露。其实在美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两只最大的战舰“长门”、“陆奥”相继被击沉海底，“皇军”仅有的四艘航空母舰也只剩下了两艘，日本朝野已慌作一团。

远在东北的关东军与侵入中原的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军用物资供应不上。别说日本本土，就是富庶的满洲大地也被他们掠夺、榨取殆尽，连司令部的日本人饭碗中也掺进了豆子和高粱米。那些浑浑噩噩的“军棍”们照样作威作福，将关东大地搅成了一个群魔乱舞的世界。

为欢迎李云龙司令上任，江上军在哈尔滨最大的“宴宾楼饭店”大摆宴席，一共开了二十多桌。回家养老的尹大胡子也以军事参议的身份被请出席。没想到张团长在宴会上借酒耍疯，堂堂上校团长竟坐在地上大哭大嚎：“我太憋气啦！司令要给我做主啊……”鼻涕眼泪抹了满脸，真是大煞风景。不知他哀求的是新司令还是原司令。其实都是傀儡，哪个也没法给他做主。于团长笑呵呵地看着他被人拖出大厅，像看一出滑稽戏。

内田顾问的夫人，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但皮肤白皙，眉目和善，比起我那远在黑河的师母还显得年轻，风韵犹存，只是头上已出现缕缕白发，怪不得要经常染染。不知道她是

什么时候来的。内田顾问把我叫去，一进门，这老太婆竟站起来向我鞠躬，吓得我连连还礼如扇风。顾问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让我带她去找那个有“祖传绝技”的理发店老板。吉祥理发店离司令部也就五六百米远，顾问的汽车司机叶山（台湾人，改了日本姓）却把汽车伺候在了楼下。我小心翼翼地将夫人扶上车，司机大概没等换档，车已到了店门口。由于我事先有过关照，冯掌柜忙不迭地迎了出来。他拿一套全新的用具使出浑身解数，献出“祖传秘方”（天知道）将老太太侍候得十分惬意。我告诉叶山，两小时以后再来，让他先把车开回去了。

这日本老太婆很风趣、健谈，问这问那，让冯掌柜消除了紧张情绪，将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老太婆连说：“想不到满洲人竟有这样高超的技术！我要替你们宣传，和日本人竞争一下！”说着，哈哈大笑。

还不到两个小时，叶山就把汽车开来了，告诉夫人，顾问在车上。正好活计已经干完，冯掌柜不会梳日本发式，通过我向夫人解释。老太太摆摆手说：“好极了，就这样晾着回家。”然后掏出十元日币放在柜上，连说辛苦了，一定再来。冯掌柜推托不得，拿起日钞愣在那里。我和叶山陪夫人一起出来，果然满头黑发，光彩照人。内田顾问坐在车里微笑着捋他的仁丹胡。等车开走，我又回到店内，冯掌柜死气白赖非要把那十元日币塞给我不可，我岂能赚人家这点辛苦钱呢。特意关照他把这件事赶快吹出去，让人人都知道日本顾问的夫人将月月光顾本店，你老头儿就是夫人的专职理发师！今后看谁还敢上吉祥理发店来撒野？冯掌柜激动得点头如鸡啄米，老眼里含着泪花。

从此以后，这老太婆果然每月必来一次，有时还带来别

的日本女人来染发。这可是比司令部里任何工作都重要的差事。为此我每月必为顾问夫人服务两小时，连宫崎副官也无奈我何。我手里有一种叫“门鉴”的出入证，是一种木制小牌，上有铁烙印，专发给与司令部有业务往来的人员，如印刷厂、文具店、家具店、西服店等等。这回我也给了冯掌柜一个，他像接圣旨似的捧在了手里。从此他便可以凭这东西自由出入司令部大门，来给顾问修修胡子、刮刮脸。我又在日、“满”军官堆里给他拉了不少“主道”，巩固了他“御用”理发师的地位。冯掌柜人情练达，常打发他儿子买些礼物送来孝敬他的老师——我老婆。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照例由后大门进了司令部。惊讶地发现今天加了双岗，而且卫兵手中的枪全上了刺刀。院当心摆放着六七个用军毯裹着的或圆或长、形态不一，像行李似的大包袱。有些毯子下边血迹斑斑。我立刻明白，发生了重大的流血事件！